

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让我们以为今人与古人的生活是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但是当我真的触摸过,古代那些活生生的人触摸过的东西后,这条鸿沟似乎被打破,古人生活的画面似乎就浮现在眼前,令人着迷。

王小蒙：我和耀州窑的缘分



（左）带着王小蒙在耀州窑遗址工作。

上世纪80年代,中国陶瓷考古学家褚振西

- 口述:王小蒙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 记录:王慧莹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小蒙在清理唐墓壁画

发掘出一座五代窑炉遗址

我的老家在陕西周至县,很早我就开始学画画。我的绘画老师在县文化馆工作,兼做文物鉴定,他能把文物的内涵一一讲出来,我很是羡慕,这也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高考时我报考了考古专业,因为觉得考古和文物鉴定很接近。

那时,我经常在画报上看到一些景德镇师傅在瓷器上画画场景,很神奇,我也渴望在瓷器上面进行创作。本科毕业后,我选择继续留在西北大学读研,研究方向即是陶瓷考古,我的指导老师是常年耀州窑遗址做发掘的褚振西老师,所以,研究生期间我就开始了在耀州窑遗址的田野实习。在褚老师的指导下,实习期间我有幸发掘出一座五代时期的窑炉。耀州窑的历史是从唐到明初,这中间五代时期的出土文物最少。之前虽然发现过五代的窑址,但很残破。而这次发现的五代窑炉保存得非常好,这也是我和耀州窑的一种缘分吧。五代窑炉的出土,使得这一时期的烧制工艺面貌更加清晰了。

现在耀州窑考古发掘报告出了三本,分别为唐代、五代和宋代时期,而这个报告里面如果没有完整的五代窑炉遗址则是很大的缺憾。这也是毕业以后我还想回耀州窑遗址工作的一个原因。

1990年我被调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再次跟随褚振西老师,参加耀州窑遗址的发掘。当时要修西铜高速公路,要穿过耀州窑遗址,我们配合基建对耀州窑遗址进行了一次大的挖掘。这个地方还有两条道,一条是20世纪30年代修的咸铜铁路,当时是穿过耀州窑遗址的,还有一条公路,则是2000年以后修的,则是避开窑遗址从西部绕过的。通过这三条交通线路的修建也能看出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巨大进步。

耀州窑开创了一种官窑风格

陕西窑址不多,耀州窑是一枝独秀。耀州窑创烧于唐代,没落于元代,其间烧制出了许多名满天下的精品,是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窑是唐代离长安城最近的窑场,到了晚唐,它的烧青瓷水平已经比较成熟。而晚唐烧青瓷其实是逆潮流的,当时瓷器的格局是“南青北

白”,所谓“南青北白”就是北方大多是烧白瓷的,南方以越窑为中心是烧青瓷的,但是唯独耀州窑,在唐代晚期它的青瓷烧得好。唐代陆羽在《茶经》中,把各个窑口的茶具排了个序:“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窑次、岳州次……”我们认为鼎州窑就是唐代耀州窑青瓷。耀州窑为什么烧青瓷而不烧白瓷?因为它离唐长安城很近,当时很多越窑的精品青瓷都到了长安城,像大明宫遗址,还有唐代一些贵族墓里都出现过越窑的青瓷。而距离长安城近,耀州窑工匠是能看到这些上等青瓷的。当时这里的工匠们,要在北方竞争白瓷,不一定能竞争过,但越窑青瓷虽然精致,距离唐长安城很远,运输成本高,所以耀州窑烧青瓷就有地域上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耀州窑的工匠们就选择了发展青瓷的道路。

耀州窑的第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当属唐末五代时期。这个时期从普通的民窑粗瓷一跃而开始烧精细的青瓷,尤其是青瓷中最美丽的天青釉瓷的烧制,开创了一种青瓷的新风尚。而这种风尚在北宋被汝官窑发扬光大,汝窑的天青釉,以及细小的芝麻钉支烧都与五代耀州窑相关。这种釉色天青釉质如玉的风尚直到

南宋官窑一直延续,所以,可以说,五代耀州窑开创了天青釉这种官窑风格。

我们目前还在继续的一个项目是银沟遗址的发掘。在银沟遗址发掘前,有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新的窑口——鼎州窑。这个消息出来后,我们也很兴奋,如果能找到文献中的鼎州窑,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通过进一步勘探和发掘,确认了这个地方是富平唐宋县城——义亭城所在,也是全国仅见的一处保存完好的唐宋县城遗址,经历了600年繁华。我们已经证实了它是从唐代延续到元代,这里的地层堆积物里有大量的这个时期的遗物,元代以后就很少了。通过地层堆积来了解遗址的历史,从包含物来了解遗址的性质,从出土的遗迹来了解遗址的布局,这大致就是我们的工作思路。

富平县城离耀州窑址只有30公里,在宋代的时候是属于耀州管辖的。它和耀州窑是什么关系?这个地方还发现了一些五代到北宋初比较好的天青釉的标本,这里是不是耀州窑产品对外流通的一个集散地?如果这一点被证实,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银沟遗址的发掘,也是耀州窑研究的一部分,可以了解耀州窑的销售情况。

我的眼界不能仅仅集中在陶瓷考古

我有幸在耀州窑待了多年,虽然吃了很多的苦,也奠定了我这几十年来专业基础和发展方向。但是如果仅仅只关注陶瓷考古,思路打不开,研究也很难深入。所以在耀州窑遗址工作了几年后,就去参加唐代墓葬和唐代帝陵陵园遗址的考古发掘,后来又出国去日本,拓展了眼界和思维的宽度。

陶瓷窑址出土的东西和墓葬里出土的东西,有很多不吻合的地方,如果不做这方面的工作,就了解不到这一点。举个例子,在挖掘了唐代节愍太子墓和整理了懿德太子墓报告后,我发现这两个太子墓都有大批量的唐三彩出土。陕西的黄堡窑烧制唐三彩,醴泉坊窑烧制有唐三彩,但是我发现这两个墓里的唐三彩都不是这两个地方的。

这之后我不只研究唐三彩器物本身,还开始研究唐三彩的产业和流通。这两个墓里面的唐三彩,有一部分应该是河南洛阳生产的,洛阳唐三彩的销售范围和陕西这边唐三彩的销售范围是什么情况?这些窑口之间有没有工艺技术的交流,通过墓葬里出土的东西,就可以找到很多研究线索。

在发掘唐代贵族墓和整理懿德太子墓资料时,让我对唐代的贵族墓葬的丧葬习俗以及

唐代壁画的绘制水平,壁画的题材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比如唐李道坚墓中的一组屏风画,它是模仿当时的实物样子,在棺床周围围上屏风,但不是屏风的实体,而是屏风的壁画。李道坚墓中的壁画是6幅山水屏风画,这一发现震惊了业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巫鸿先生是国际知名的艺术史和美术考古大家,也特别关注这组山水屏风画。他还专门带队到我们的工地参观,在墓室里面一待就是两小时。墓葬发掘完以后,我们也对山水屏风画仔细地进行了扫描,观察和讨论了它的绘制过程、墓葬的建造过程。无论是墓葬挖掘,还是进行懿德太子墓报告的整理,对我在古陶瓷的研究领域,都是一种拓宽,为我未来的考古研究之路带来了更多可能。

古人生活的画面似乎就浮现在眼前

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让我们以为今人与古人的生活是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但是当我真的触摸过,古代那些活生生的人触摸过的东西后,这条鸿沟似乎被打破,古人生活的画面似乎就浮现在眼前,令人着迷。

在富平县定陵挖掘500座唐代砖瓦官窑时,我们有了一次意外发现。当时,我们在清理窑炉本身时,在窑炉壁和隐蔽的烟囱中,发现了字画。这些字画有的能辨认,有的辨认不了,为什么辨认不了?因为它是重重叠叠的。这些字画是窑建好以后写上的,写完后才开始烧窑,一烧窑窑壁就变硬,字画就留下了。我们推测是工匠技师在建窑时留下的。烧窑的工匠是分等级的,在唐代文献里记载,水平特别高的工匠叫巧儿匠、长上匠,能写出这么好的字,画出这么好的画的肯定是有了一定文化水平的人。看着这些字画,当时工匠工作时的场景就从脑海中闪过,我们和这些遥远的古人似乎离得更近了。

在做出土器物整理时,遗物上留下的每一个细小的痕迹都能让我们感受到古人又站在我们面前。对懿德太子墓报告的整理,是我利用周末完成的。那段时间,一到星期五下午,我便独自开车到离西安市大约50公里的乾陵博物馆,懿德太子墓的资料都在那里。在出土的陶俑的躯体上,发现了工匠翻模时留下的指纹。夜晚一个人静静地办公室里,看着和我脸对脸距离只有20厘米的陶俑,我们之间似乎在进行一种无声的对话。干考古工作这么多年,这些美好的画面和新发现,大概也是支持我们这些考古工作者能够吃苦,耐得住寂寞,把这个事情做下去的原因吧。

曹静芬(原名曹靖芬),15岁入伍后,经过部队的培养成为朝鲜战场上的译电员,后来历练成为一名“女神枪手”,作为新中国第一批体育运动健将代表国家出征,先后参加了国内国外射击专项比赛和大型综合体育赛事20余次,多次夺得冠军,曾八次打破国家射击记录。

- 口述:曹静芬 新中国第一批射击项目运动员
- 记录:杨娜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15岁成为一名解放军译电员

1935年,我出生在河北深泽县。1943年,由于日本鬼子在老家那片儿闹得厉害,我妈领着哥哥和我从河北躲避战乱来到了陕西,来到了在西安工作的父亲那。后来,我在西安上了小学。西安解放后,我又上了初中。

1950年,响应“青年参军”的号召,作为班里唯一报名参军的女学生,我来到了西北军区机要处成了一名解放军译电员。那时候,志愿军在朝鲜进行抗美援朝战斗,打仗时间长了,部队因战减员。后来,西北军区司令部和在朝作战的十九兵团司令部机要人员进行人员轮换。就这样1953年我到了朝鲜战场,成为十九兵团西线指挥部的译电员。

那时候,敌机天天在头顶上飞,炸弹扔到山里,山里整天轰隆隆作响。当时正值上甘岭战役最紧张的时候,我们机要处译电员,时不时半夜要爬起来收发电报。在朝鲜的时候,虽然生活艰苦,但指战员们精神头都很好,有困难大家一起克服,那是一段值得纪念的日子。

入朝以后,我们每个机要人员配发一把自卫手枪。我经常拆卸、擦拭、练习瞄准……1954年,在志愿军西线指挥部机关手枪实弹打靶训练中,我这个身高不到一米六,体重不足90斤的女同志,手枪实弹打靶成绩竟然是三位优秀者之一,甚至比另外两位优秀者——作战参谋和警卫战士的成绩还要好。司令部机要处出了个“女神枪手”,一下子吸引了西线指挥部干部战士们的目光。

1955年,志愿军司令部召集在朝各参战部队枪打得好的同志到司令部进行选拔,选上后参加国内射击比赛。我擅长的是手枪射击,但到志愿军司令部后,才知道当时没有女子手枪比赛项目。于是,我改为步枪选手参加选拔,射击姿势由站立改为卧姿,瞄准也从手枪短距瞄准改为步枪的长距瞄准,标靶也从手枪最远距离50米改为步枪距离50米和100米两项。这些改变对于我可谓是从头再来,困难重重。

我之前没打过步枪,第一次射击时,我连枪栓都拉不动,每打一发,还需要教官来帮我装弹退壳,打了几次后,我就开始摸索着装弹退壳,慢慢地发现了寸劲和巧劲。练了一段步枪后,我步枪也打得很好,我这个瘦小的译电员以优异成绩入选志愿军射击代表队,和其他十几个人一起代表百万志愿军战士回国参赛。

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射击项目运动员

回到北京,我们参加了来自全国各个军区的200多人的选拔赛,从中选出的十几个人要参加首届社会主义国家射击比赛。尽管体格、体力偏弱,但是凭借射击成绩突出、技术稳定、心理素质好的优势,我还是在这次全军比赛后被选入了国家体委刚刚筹办组建的国家射击女队,成为共和国第一批射击项目运动员,开启了从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译电员向专业射击运动员的转变。

1955年,首届社会主义国家射击比赛在中国举办。这是我们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射击比赛。比赛前,周恩来总理来到射击场了解训练情况,当时我们都在举枪训练,周总理在射击基线后面观看,当他走到我后面时停了下来。这时队长赶紧叫我过去见总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既紧张又兴奋,我向总理汇报了训练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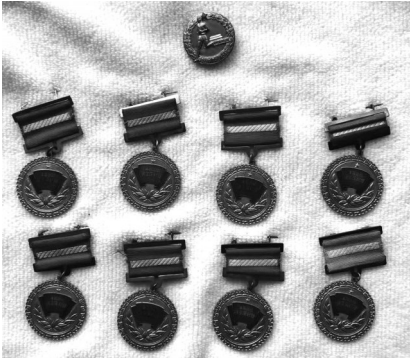
1956年,我国准备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各体育项目都在紧锣密鼓备战、选拔、训练。国家射击队也不例外,在奥运选拔赛上,我再次打出好成绩,达到了运动健将的标准。

当年10月18日,我和其他运动项目共计49位同志在工人体育场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还亲自授予我们49人运动健将证章、证书。那一天,我们49人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体育运动健将。

2016年10月18日,“共和国体育健将六十载”纪念活动在北京体育馆举行,射击队就我一个人参加了活动。1956年被授予第一批运动健将的49人,只有12位老运动

家纪录证章和首批破国

家纪录证章和首批破国



家纪录证章和首批破国

家纪录证章和首批破国

员参加了这次活动。其他人或去世、或有病行动不便,我感觉自己80多岁能参加这次活动还是挺幸运的。

我从事射击运动15年里,先后参加两次全运会,两次全军运动会,三次社会主义国家射击运动会,三次中苏友好运动会,中苏、中德(东德)通讯射击赛,雅加达新兴力量运动会,柬埔寨亚运会和莫斯科公安系统国际警察(迪纳摩)射击赛等。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59年代表公安系统参加的社会主义国家警察射击赛。在比赛现场,我用立、跪、卧三种姿势打出90发子弹,2个多小时比赛中弹无虚发,当我扳响最后一发子弹后,当值裁判报出最后一枪射击成绩时,我心里又成功了,教练的记录成绩应该比苏联射击名将顿斯卡亚多出3环。然而,当大会正式公布比赛成绩时,却变成了顿斯卡亚领先2环成为冠军。我在现场提出抗议,并要求复靶重新计算。这时候,苏方教练组紧急找到中方教练组沟通,主动提议说,顿斯卡亚一直是世界冠军,发奖时奖品可以互换。也因此出现了在世界体育发奖台上亚军手捧着冠军奖品,冠军手里拿的却是第二名的奖品的奇葩一幕。

这次事件让我切身体会到,运动比赛就是和平时期的“较量”,我这个当时没有名气的运动员要想拿冠军,为国争光,就要打出更好的成绩,让对手无话可说。为此,我更加刻苦训练。

1960年7月,恰逢在莫斯科举办社会主

义国家友好运动会,当时我已有5个月的身孕,但为了国家荣誉和一名“老运动员”的责任,我毅然出征,国家体委党组也指示运动代表团做出精心安排,派专人负责拿我的步枪和行李。在3周的比赛中,对我而言最难的就是小口径步枪射击立、跪、卧三项中的卧姿射击,已经隆起的肚子对稳定身体和保持长时间一个姿势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瘦小的身躯不停地在地上扭动,让身体保持既能稳定射击姿势,又要不伤到肚子里的孩子,最终我夺得冠军,这也成为我国射击运动史上的传奇故事。

枪打得好的“法宝”

几十年过去后,我在从四川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听到邻座的一位姑娘和同伴谈论:“我平时训练时成绩不错,为什么比赛时总打不好?”听起来好像跟射击有关。我便主动同她们聊起天来,得知她们是外出参加比赛的北京市射击队队员。当年轻的运动员们了解到眼前这位奶奶是我国第一代射击运动员时,随即报告了带队教练,教练得知我的姓名时,惊讶地说:“您就是为国家荣誉带孕出征的英雄啊,我们当运动员时就听教练们讲过您的故事,我后来又讲给了我的队员们听。”

1961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射击训练事迹突出、成绩优异,国家射击队给予记功一次。1962年我被选为全国青联委员,1964年被选为国家体委共青团委员

会委员,多次作为有突出贡献者参加人民大会堂重大庆祝活动,以及国庆观礼和国庆宴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别人问我枪打得好的“法宝”是什么,其实就是平时训练,我不追求每次打到10环还是9环,而是把打得好的时候的感觉“固化”下来,每次打得好的时候,我会放下枪活动一下,再拿起枪时,重新调整姿势,看能不能恢复到那个状态。比赛如果不顺利了,我就重新调整,一定要找到好的状态,从动作、姿势、感觉上让人和枪结合到一体,做到“有意瞄准,无意击发”,把技术发挥到极致。

“文革”期间,我国除三大球和国球等少数几个运动队保留外,其他运动队都被解散了,教练、工作人员到五七干校,年轻的运动员分配到工厂工作。我也从运动队被分配到了邮电部所属508厂当了一名车间单晶硅磨片工。

12年后,我成为508厂成品车间的车间主任,后来又调到邮电部纪检组、监察局任处级监察员,在这个岗位上干了9年直到光荣退休。

回首走过的路,自己从一个西北的小姑娘入伍后,经过国家的培养成为朝鲜战场上的译电员、代表国家出征的射击运动员,何其幸运!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不论当兵、当译电员、当运动员、当工人、进机关,我都服从组织安排,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这一辈子我努力过了,国家也给了我肯定和荣誉,我很满足现在的生活。